

立足田野 叩问古今

——解析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

周飞亚

“对石制品原料做热处理的炉灶,为东亚首次发现,加之早期陶器已经在少数地区出现,说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发明的有控制性用火,至此已经迸发出文明的火花,中华文明探源,应该向更久远的历史纵深推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入选的考古新发现,包括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新疆温泉县呼斯塔塔青铜时代遗址、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葬群6个项目。这些新发现,不断解决重大学术问题,为历史文献记载提供实证,丰富我们对古人类发展的认识。

新庙庄遗址位于被誉为“旧石器考古圣地”的泥河湾盆地。遗址发现距今12万—1.3万年的6期遗存,包含石片石器、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石叶、小石叶、细石叶等石器技术,构建起贯穿晚更新世的文化序列。其中,小石叶技术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2号地点发现的小石叶技术距今4.5万—4.2万年,为华北乃至东亚最早。莫斯特石器是首次在华北地区被发现,意味着尼安德特人群可能到达或影响中华腹地。5号地点出土的数量丰富、质材多样(尤其是海洋性动物骨骼材料)的穿孔装饰品,不仅是当时人类审美追求的物证,还蕴含当时古人群远距离贸易、手工业专业化、社会分层与复杂化等多方面信息,与复杂用火遗迹、精美石器一道,预示一场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技术与社会革命即将发生。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分布范围广、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对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下层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为探索中原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遗址

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陶塑,主要为人物及动物形象,其中的人面獠牙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之一,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神面形象的源头之一。对出土的陶质小尖底瓶的检测,发现了采用水稻为原料的红曲霉发酵技术进行酿酒的证据,为探索仰韶文化尖底瓶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庙庄和裴李岗两个遗址,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进行过多次发掘,如今,新一轮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揭示出多个新地点和前所未有的材料与信息,使老遗址再次焕发出新活力。这也提醒我们:在新的学术理念和科技手段支撑下,一些早期调查、发掘、研究过的区域或遗址,可能仍具备以前未能认识到的学术价值。

红山文化晚期人群为何在辽西地区突然失踪?他们迁徙到了何处?长久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终于解开了谜团。碳14测年显示,郑家沟遗址1号积石冢年代距今5100年至4800年,遗址既保留了红山文化典型元素,又兼具本地特色,可能代表了红山文化向西南扩散过程中与张家口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对1号积石冢出土的24例人骨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郑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有很强的遗传联系,应属同一族群。墓葬和祭祀坑出土有器物600余件(套),包括大量用蚌、珍珠、螺等制成的饰品,其中的球形玉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

郑家沟遗址证实红山文化曾向西南迁徙,延长了红山文化的时间轴线,扩大了其分布范围。遗址考古项目领队龚湛清介绍,目前,已在张家口地区发现同类积石冢200余座。“这片区域有没有牛河梁坛庙一样的祭祀中心?这些冢的结构是否有所区别?冢之间是什么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指出,遗址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这些问题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呼斯塔塔遗址是一处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

核心区外围遗迹构成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聚落。东区墓地内的一座大型墓葬,年代为公元前2800—前2600年,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形制特殊。墓中出土的一把铜刀,是欧亚草原所见最早的锡青铜制品之一。出土的杖头为戴帽子的人面形象,面相写实、逼真,前所未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呼斯塔塔遗址的发现丰富了人们对新疆青铜时代的认识,期待未来获得更多发掘成果。

琅琊台遗址考古确认了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山顶建筑基址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分为多个层级。最上层为核心殿堂基址,东、西两侧不同层级台面上发现房间、廊道、院落门址、石铺道路及排水设施等。出土的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可证实文献中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筑“琅琊台”的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琅琊台遗址集中展现了早期王朝的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机制的又一例证。

巴达木东墓群是一处晋唐时期的墓葬遗存,为深入研究晋唐时期国家治理、文化融合、丝路交流提供了关键性实物资料。唐墓随葬器物以彩绘泥俑为主,主要有“四神十二时”俑、男女立俑及马、牛、驼等动物俑。口含、手握钱币的葬俗普遍存在,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出土《天宝八载木券》一组,残存墨书230余字,初步释读应与中原丧仪中的“斩草仪”有关,展现了西域社会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遗存内涵丰富,再现了西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场景,见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与文化浸润。

此次入选的遗址,大多经历了数年的发掘研究,如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持续8年,呼斯塔塔遗址发掘历时10年,琅琊台遗址至今已7年。这说明,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并非仅仅源于运气,而是锲而不舍、砥砺前行。众多考古人立足田野,叩问古今,几多辛劳、几多挫折,在艰难与困惑中偶有拨云见日、柳暗花明的突破与惊喜,推动着我国考古事业登上新的高峰。



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净瓶(左)、浙江钱镠墓出土秘色瓷夹耳罐。郑建明供图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吴越国及其文化再次进入大众视野。秘色瓷,作为这一时期工艺美术的巅峰代表,不仅是吴越国保境安民、纳贡中原的物质见证,更是江南文化典雅精致精神内核的艺术结晶。

世人多从诗句中想象其美:晚唐陆龟蒙赞其“夺得千峰翠色来”,五代徐寅喻其“巧刷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同时,“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的说法,又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一跨越千年的迷雾,直至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开启方被驱散。地宫出土的13件青瓷器,与《衣物账碑》上“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钁;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的记载完全吻合,世人方知传说非虚。

作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专为官方烧制的顶级瓷器,秘色瓷既服务于吴越国王室的日常与礼制,亦作为重要“国礼”大量进贡至中原。在吴越国钱氏王陵及贵族墓葬中,如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镠的父母钱宽、水邱氏夫坟墓中,其子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及其夫人马氏康陵中,都出土了众多品质卓越的秘色瓷,述说着王室的奢华与内部的礼制规范。其作为贡品的踪迹,远播至中原王朝与北方辽国。北宋皇陵出土的云纹铁套盒、辽祖陵出土的龙凤纹大盘、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青瓷官字款盘、辽代贵族墓葬韩佚墓出土的人物宴乐纹执壶与温碗等,皆被视为秘色瓷。它们共同勾勒出秘色瓷作为顶级商品与政治礼物所构建的璀璨脉络。

这些秘色瓷由何处烧造?2017年浙江慈溪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为这抹天青传奇找到了确切的产地。此次发掘不仅确认该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秘色瓷的核心窑场,更以一系列关键证据建立了从生产到使用的完整链条:除了造型和胎釉特征相符外,窑址出土的个别瓷质匣钵上清晰刻有“罗湖师秘色碗”字样;窑址中的八棱净瓶残片,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棱净瓶底款完全一致。这些发现,使秘色瓷生产与流通的对应关系有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

秘色瓷作为越窑艺术的巅峰,代表了一个时代工艺与审美的完美融合。秘色瓷的美学核心,在于摒弃繁缛纹样,以造型的端庄气度与釉色的温润内敛取胜。其器型丰富多样,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托等。每种器物又有多种造型,尽在简约线条中蕴藏匠心。其釉质莹洁,光泽柔和,观之如远山含黛,触之若春水微澜,充分契合了江南文化自唐以来所崇尚的雅致、含蓄的审美气质。

为追求“如冰似玉、无水似水”的艺术效果,工匠们首创了瓷质匣钵以釉密封、单件装烧的极致工艺,确保了釉色的纯净与完美。每一件器物,从拉坯修形到满釉封烧,皆不计工本,精益求精,体现了其作为晚唐五代官窑用瓷的专属属性。秘色瓷开创了以釉色与造型为核心的高端青瓷审美范式。其天青釉色与精细工艺,完成了对金银器韵味的巧妙转化,不仅为后世汝窑、南宋官窑的“雨过天青”提供了美学源头,也深远影响了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釉乃至高丽青瓷的审美取向。

为何在乱世中这抹天青能达到至臻至美之境?答案深植于吴越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当五代十国战乱频仍之际,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在钱氏三代治下,70余年相对安定,为手工业的登峰造极提供了土壤。同时,为在乱世中生存,吴越国力行纳贡中原之策,以精美瓷器换取政治认可与和平。为此,吴越国在越窑核心产区上林湖设立“省窑瓷务”,管理窑业生产,开创了早期“官窑”制度。后司岙窑址出土的“官”字款匣钵、窑址附近出土的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墓志罐上“贡窑”的记载,都确证了其官方烧造属性。正是这种垄断性资源投入与制度化生产,为秘色瓷的极致工艺奠定了基石。

如今,在博物馆的展柜中,我们依然能与那抹天青相遇。它静静地诉说着一个王朝的故事、一个家族的智慧、一个时代的审美。秘色瓷是泥土与火焰的传奇,是工匠与诗人的对话,是吴越国在乱世中创造的一抹文明亮色。它没有随着吴越国的消失而湮灭,反而化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在宋瓷的辉煌中重生,在千年的传承中不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一抹天青传千年

郑建明

考古中国

这些将领及官员克奉正朔,对维持西域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见证了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巴达木东墓地发现的这些东西,可以说明来自东南西北的人群,在大一统的唐朝统治下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如程奕、李重晖两个高级官员的墓志显示,他们分别来自邯郸和天水地区。程奕的长官叫李元忠,是粟特人,但在安史之乱后还坚持守土有责,直至唐朝最后退出西域。

这项考古发现也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包容交融的见证。M20发现的彩棺前后高低、前宽后窄,这种形制的棺最早可以溯源到山西战国西汉石棺墓文化,和著名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有关系。彩棺上的翼马,可能是东罗马文化元素。M12出土的金银平脱器,显然是唐代宫廷赐赠的高级政治馈赠品。还有东罗马的金币、波斯银币、突骑施钱等外来货币,都见证了丝路的繁荣。

吐鲁番巴达木东墓地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遗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边疆治理的考古见证

郭物

吐鲁番气候干燥,埋在地下的文物仿佛被封存在时间胶囊里,一般都保存得很好。尤其文书等文物,其他地区的遗址往往难以保留,但由于同样的政令文件会传到中央王朝治下的各个地方政府,吐鲁番为我们保存了历史现场。

吐鲁番考古发现的墓地,从比较早的洋海墓地一直延续到汉唐,巴达木东墓地是阿斯塔那墓群的一个延伸。阿斯塔那当年发掘出土了许多文物,尤其是大量的吐鲁番文书,形成了吐鲁番学。因此阿斯塔那墓群很早就被保护起来了。但巴达木区域变成了葡萄园,当地居民对葡萄进行灌溉时,水会突然陷下去,人们才知下面有墓葬,因此很多墓葬被灌溉的水侵蚀了。从2022年到2025年,考古团队做了大量工作,才有了这项特别厚重的考古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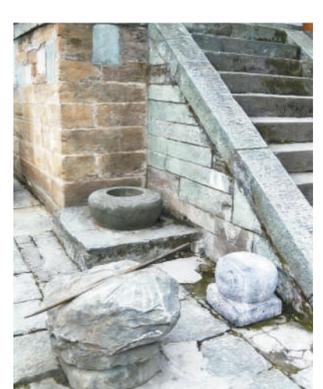
巴达木东墓地,至少有3个方面的重要价值。首先,这是中央政府边疆治

理的证据。我们知道,汉朝在西域的统一主要靠西域都护府,后来通过五争车师,公元前48年在吐鲁番设置戊己校尉,是通过军政机构的方式统治。到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40年收复吐鲁番的时候,如何来统治这块地区,在朝廷上还有争论。当时魏征和褚遂良都主张用古法,设一个只管军政的机构,唐太宗坚持用正朔方式统治,把整个环东天山地区进行编户齐民。唐太宗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此地汉文化已有深厚基础,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文化认同,都可以同中原一样进行直接统治,所以才设了西州,并把最早的安西都护府放在这里。从汉到唐,这是个开花结果的过程。清代能收复西域,故土重归,也是因为中央政府长期在边疆治理奠定的基础。这些墓葬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墓主人都是入籍唐朝的,很多是唐朝的正式官员,按照唐代的体制升迁移动,生老病死死后按当时的礼制进行埋葬。

静地里,对照“铁杆磨针”的纯粹,思考如何守住初心、磨炼政德。这时候,这井、这杆,就又成了映照心境的镜子。

同一件文物,被不同的人读出不同的深意,却都指向了“坚持”这个内核,成为人们的“精神充电宝”。

离开时,夕阳为姥姆亭的飞檐镀上金边。回首望去,那庭院静静矗立在苍茫山色中。我知道,这个属于家门口的故事,仍将被清风、被时光、被一代代心怀念的有心人,温柔地传诵下去。



武当山“磨针井”。赵亮供图

磨针井畔的故事

赵亮

我的老家在湖北十堰,武当山脚下。记忆中,七十二峰是呼吸的轮廓,而山腰间那处叫“磨针井”的小小道院,则是一枚安详的句点。它不像山顶那般引人仰望,只静静地守在登山古道旁,仿佛一位慈祥长辈。小时候上山,总把这里当作中途休息的驿站。大人们去殿里,孩子们便趴在姥姆亭的栏杆上,盯着亭中那口深幽幽的井和并瓮里微笑磨杆的铁铸老母像发呆。对于孩童而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过于深奥,倒是那井水的清冽、殿壁上色彩古拙的《真武修真图》壁画,以及殿前乌黑发亮的两根碗口粗铁杆,构成了一个似懂非懂的奇幻世界。

后来,我外出求学、工作,鲜少返乡。直到前些年,回老屋收拾旧物,事毕,又驱车上山,独自重访了磨针井。道院依旧纤巧玲珑,翠林环绕,时光在这里被滤得缓慢而宁静。与童年记忆不同的是,院子里多了好些稚嫩的面孔。一群身着练功服的少年,正在一位师父的带领下,于古井旁的树荫下凝神习练武当拳法,身形起落,悄然无声,唯有汗水滴落石板。领队师父告诉我,磨针井“志道苦修”的精神,正是武学最好的启蒙课。那一刻,古老的殿宇与鲜活的生命力交织,我忽然对“磨针”二字,生出了前所未有的触动——它磨的,何尝不是游子心中那根名为“乡愁”与“初心”的杵?

往后几年,但凡回老家,只要得空,我总会绕上来看。就这样,我与山上的文保员熟络起来。记得一个山日下午,我见他正拿着记录本,细细查验殿宇的梁柱。我们聊了起来,谈起磨针井,他如数家珍:“别看这院子小,它是武当山古建筑群这顶‘世界遗产’皇冠上的一颗别致的宝石。”他引我看屋檐的雕脊,看石碑上镶嵌的已有5亿年历史的“直角石”化石。他指着一处有修复痕迹的砖瓦说:“前些年,市里推进专项保养工程,我们像给老人家梳头一样,仔仔细细地给它做了维护,就是为了让它能安安稳稳地把‘铁杆磨针’的故事再讲几百年。”话语虽平淡,却让人感到一种庄严。

他守护磨针井有些年头了,储满了这里的光阴故事。“这里呀,来的都是有心人。”他的目光转向一对在铁杆前低声细语的母女。“每年春夏,尤其是考试季,很多家长特意带孩子过来。不单是祈福,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誓师。大人摸摸铁杆,孩子看看老母像,那种‘一起使劲’的眼神,比任何说教都给力。”

最让人感慨的,是磨针井作为“道廉文化教育基地”的独特角色。常有党员干部来参观学习,在这“抱朴守一”的清



本版邮箱:ysbj@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飞亚
版式设计:沈亦伶

故乡的明城堡

董得红

雪花也在空中摇摇晃晃,半天才落地。城壕由一堵高大宽厚的墙和墙东南侧一座相连的土庄廓组成,壕宽约2米,城墙高有10多米,由黄土夯筑而成。据祖祖辈辈居住在堡子里的老人说,最早的堡子四方方正,南北各有一个城门,城门顶上有机楼,城墙上可以走马车。我曾去过住在堡子里的一个同学家,他家的南墙就是城墙,在城墙上盖了一座小土楼。

1977年恢复高考,我通过考学离开村庄,毕业后在外谋生,再也没去过小学校和城壕。2019年春节回家时,我遇到留在村庄的小学同学,他告诉我,小时候天天看到和走过的堡子是明城堡,墙根里立了碑,被保护起来了。

再后来,一年夏天,在同学们的倡议下,我们邀请了小学的老师一起去看

看学校和城堡。10多个满头华发的学生,伴着年已古稀的4位老师,沿着城壕缓缓慢行。比起当年,城墙似乎变得更为苍老、低矮,墙面上被雨水冲刷的沟壑也更深了,但墙体依然完整。北墙根竖立的一块石碑吸引我们走向前,只见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海明长城——平安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1年6月25日公布 青海省人民政府2018年7月30日立”。

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从墙根走过的住着几十户人家的堡子,竟然是万里长城的组成部分,真不可思议,那可石碑上的字写得清清楚楚。昔日的土墙瞬间变得庄重、肃穆起来。我将脸庞紧贴于城墙上,用手轻轻抚摸着城墙上

的土粒,脑海里浮现出多年前在城壕里度过的时光。